

澳大利亚教育译丛 杨婷匀 主编

教育市场论

Markets in Education

西蒙·马金森 著
金楠 高莹 等译
万秀兰 刘力 审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教育译丛 杨婷匀 主编

Australia

教育市场论

Markets in Education

西蒙·马金森 著
金楠 高莹 等译
万秀兰 刘力 审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市场论 / (澳)马金森著;金楠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2

(澳大利亚教育译丛 / 杨婷匀主编)

ISBN 978-7-308-06331-9

I. 教… II. ①马… ②金… III. 教育—市场学 IV. G40-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117 号

Markets in Education

Copyright© Simon Marginson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by Allen & Unwin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06—69 号

教育市场论

西蒙·马金森 著 金楠 高莹等 译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18 千字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331-9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缩略语和有关术语说明

ABS	澳大利亚统计局
ACTU	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
AEC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AEU	澳大利亚教育联合会
AFR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
AGPS	澳大利亚政府出版署
ANOP	澳大利亚全国民意测验
AVCC	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
BCA	澳大利亚商会
CA	澳大利亚联邦
CAPA	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理事会
CBP	联邦预算报告
CSC	联邦学校委员会
CSIRO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TEC	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
DE	教育部
DEET	就业、教育与培训部
DITC	工业、技术与商业部
ELICOS	海外学生英语推广课程
EPAC	经济规划咨询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MCEETYA	内阁就业、教育、培训与青年事务委员会
NCVER	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NSW	新南威尔士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QLD	昆士兰
SA	南澳大利亚
SC	学校委员会
SMH	悉尼先驱晨报

TAFE	技术与继续教育
UK	英国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SA	美国
VG	维多利亚州政府
WA	西澳大利亚

● 在表格中,“—”表示数据得不到。货币流通额借用 GDP 价格减缩指数(the price deflator for GDP),以 1984—1985 年不变价格计。所有价格除特别注明外都指澳元。

● 男权主义术语学主宰了学术论著。除了从法文翻译成英文时恢复性别中立之外,这里的引用语未加改变。

● 引用语中加着重点的文字表明原文中强调的重点。但并非原文中的所有强调都予以保留。

● 除了特别注明的以外,“教育”指的是所有正式的学前教育、学校教育、技术与继续教育、企业培训、高等教育和研究。

● 在学校教育中,“公立教育”指的是“政府举办的教育”,“私立教育”指的是“非政府举办的教育”。

● “普及的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招收几乎所有的适龄学生,而不是特罗(Trow 1974)所提出的 50% 及以上的学生。按特罗的说法,“大众教育”至少招收适龄学生的 15%。

● “技术”在福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所指的意义上使用,不仅指机器,而且指社会—政府实践。

● “政治”一般与权力关系是同义语。澳大利亚人并不把所有权力关系都赋予政治性,但一些权力管理可以被赋予政治性。

● “正式的政治”(formal politics)指的是由公认的政治系统所组成的制度;在澳大利亚这些制度包括:议会、国家管理机关(the agencies of government-as-state)、对立法者或舆论施加影响的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民意测验、媒体和公众辩论。其他政治形式包括地方社区和职业团体的能动性以及大众普及性运动。

● “政策”指的是国家机关的话语(discourses)及其执行程序。

● “否定”的意思是否认性的断言。

● 关于其他作者,现在时态(例如,“Hall states”),意味着对所引用的陈述的认可 and 赞同。过去时态(例如,“Hayek stated”)意味着所引用的陈述是被分析对象的一部分。在叙述性描述中,过去时态常用来描述仍然流行的现象,但当对过去进行反省时,则采用现在时态。

绪 言

《教育市场论》是我在墨尔本大学进行的为期8年的博士学位计划的结晶,旨在探索现代教育制度中市场关系的形成。这个计划是适时的。它始于1988年。那时,澳大利亚教育与大多数OECD国家的教育制度相似,刚刚进入市场化时期。此后不到十年时间内,教育市场和准市场虽然不如其积极参加者相信的那样普遍,但已成为支配性的组织框架。

这个计划也是一项富有成效的研究,促成关于教育经济政策的《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1993a)的出版;促成描述澳大利亚教育史的《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1960年以来的政府、经济与公民》(1997a)的出版;促成关于市场自由主义的专著《自由市场论》(1992a)的出版;促成关于教育中的积极竞争的一部手稿(1996)和各种各样的杂志文章的完成和发展。《教育市场论》是总结性的集大成之作,其他所有相关著作都围绕其核心论点展开。它与较早的著作不同,几乎没有重叠。首先,《教育市场论》是比较详细而明确的。它对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依据这些现象与市场形成的关系的程度而深浅不一;这样,对历史上一些关系紧密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而对另一些不太紧密的则未加详察或一带而过。其次,它视域宽广,既从理论上也从经验上考察了市场的形成,而且并不完全局限于澳大利亚。虽然澳大利亚是该书主要的案例研究对象,但该书也研究了国际普遍经验。

《教育市场论》一书的完成很艰难,但令人满意。大多数论文和著作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研究范围和研究质量上让步。但当它完成时,我觉得它是我所能完成的最好的著作(并不是说它不能加以完善!)。在我职业生涯的中期做这种反思性研究,评论自己的学术和实践工作,并填补自己在教育上的某些空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研究活动可能是奇特而陌生的,自我有时卷入其中。而且这种奇特和陌生对于解决更大的问题来说具有启迪意义。我们依赖我们对主体和客体所作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并非持久可靠,而且必须不断加以修正。我们试图综合梳理我们关于社会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试图梳理我们自己和我们零碎的记忆,对我们自己讲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而且将我们的团体和机构加以定位。在有关教育市场形成的写作中,我曾经试图尊重那种促使我们中的许多人批评和反对那些市场的顾虑。但是本书既不是一部说教性著作,也不是关于我们教育行动主义的历史。它是一种尝试,尝试着“鸟瞰”教育行动主义和其他行动主义所发生的领域,尝试着在教育和社会关系可能发展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教育市场论》不是规范性的而是解释性的研究工程(Foucault 1972,p.48; Foucault 1988,pp.16,155)。长时期的反省为消除过去对市场的传统批评提供了机会;这些批评局限于与他们所批判的东西的镜中对当关系(mirror opposition)^①,结果不可能想象任何不同的东西。《教育市场论》致力于扩大视野,展开比较全面的解释;这些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前提。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教育市场是什么?它们如何运作?它们是怎么发生的?它们将向何处去?它们怎么会有所不同?也许这些对一部著作来说已经足够。市场之外的地带留待其他著作和其他人去探索。

做一个大型研究项目意味着过一种孤独的生活,舍弃与亲戚朋友的联系和活动。但是,阅读和写作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生活:研究《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Grundrisse)等原文时的那种愉快,在其他一流的文章或著作中发现自己思想不成熟时的那种愉快,都是难以言表的。在这些年中,我建造了一个体现巴洛克风格的庭院。在这里,除了和莫扎特一起思考、和海顿一起交谈之外,我还向巴赫寻找智慧,从维瓦尔第身上寻找生活的乐趣。这个环境有助于人的理解力达到极致。这里和其他地方所列的书目显示了我的时间花费在哪里。马克思、福柯(Foucault),也许还有黑格尔的《逻辑学》都在隐隐约约产生影响。另外两个影响我的人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74a,1974b)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例如他1985年的著作)。如果说我探索的画卷是宽广的,那它相对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令人敬畏的旅途来说也只是一张邮票而已。

本书也得益于其他人创造的条件。除了我的妻子梅尔巴(Melba)和我们的安娜·罗莎(Ana Rosa)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我希望我正在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继续他们在教育领域的部分工作。彼特·墨菲(Peter Murphy)在政治经济学上,黛比·泰勒(Debbie Tyler)在福柯理论上对我1988年前的著作产生了影响。理查德·提斯(Richard Teese)的著述和莱斯利·詹森(Lesley Johnson)的鼓励使我想到了攻读博士学位。在我攻读学位期间,莱斯利、理查德、斯图亚特·马欣泰尔(Stuart Macintyre)以及海德利·贝尔里(Headley Beare)都曾给予我指导。我要特别感谢我最后一位导师罗杰·伍克(Roger Woock)。我的论文一完成,罗杰就立即仔细阅读并逐页修改,而且在最终的材料选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墨尔本大学教育系主任况李道(Kwong Lee Dow)提供了一贯而热情的支持,我也很感谢他对本书出版的协助。吉拉德·伯克(Gerald Burke)在论文成型阶段提供了帮助。特里·西敦(Terri Seddon)在中期阅读了本书稿,我们对书稿进行的讨论非常有益。珍·肯威(Jane

① 对当关系:逻辑上指具有同一素材的A(全称肯定判断)、E(全称否定判断)、I(特称肯定判断)、O(特称否定判断)四种判断间的真假关系。这种关系用图式来表示,就是“逻辑方阵”。参见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2页。——译者注

Kenway)和堂·安德森(Don Anderson)的论文对本书也很有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希拉·斯洛特(Sheila Slaughter),迈克尔·皮特(Michael Peter),吉姆·马歇尔(Jim Marshall)和彼得·鲍尔温(Peter Baldwin)都以不同的方式鼓励过我。伊恩·亨特(Ian Hunter)的意见常常与我相左,但他很有雅量,迷人而且有趣。玛格丽特·鲍里斯(Margaret Powles)帮我完善了第9章。戴维·斯普拉特(David Spratt)一直是我的老朋友。除了他以外,我还很高兴与另外两位老朋友罗伯(Rob)和苏茜·帕斯科(Susie Pascoe)分享本书。在从论文到著作的出版过程中,法塞尔·利兹维(Fazal Rizvi)的鼓励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建议明显改善了本书的结构和内容。伊丽莎白·维斯(Elizabeth Weiss)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有同情心的出版商,艾玛·科特(Emma Cotter)是一位优秀编辑。我感谢他们。

最后,我想感谢在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上和我团结协作过而且我从他们身上学习良多的所有人。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争论会继续。

《教育研究丛书》主编的序

有些事明显有异于世界正在经历中的变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理论家用“新时代”(new times)一词指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其特征是分化/分裂(differentiation/fragmentation)和同质化/异质化(homogenization/heterogenisation)并存。没有人能摆脱这些变革的影响,因为这些变革改变了生活的环境,即物质和文化条件;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解释我们的生活,确定我们的身份,建构我们的未来。但是,在这个新时代,用来评估教育工作的条件和鉴别限制教育可能性的因素的方法,迄今还没有一项教育研究能够概括得出。那么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了解新时代,并从伦理上、战略上有效地予以回应。正是这些任务,构成所出版的本丛书著作的基本前提。

新时代的一个中心特点,是它对凯恩斯理论中福利国家的主要原则的否定。凯恩斯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是一种道德原则。它认为,政府有责任控制市场,促进发展,并使社会不公最小化;认为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正是必要的。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中,联邦有劳资谈判权力,财政部门受到强力控制,交通被用来保证当地工业有机会发展并受到国内市场的支撑。

“新时代”证明了这些经济和管理原则中有许多遭到否定。凯恩斯模式快速消失,市场现在已经被视为组织现代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政府已经解除了对财政和劳动市场的管制,以便更有效地应对经济活动全球化带来的模式的不断变化和周期性的动荡。市场的复苏伴随着自由市场观念的认同;这种观念寻求国家在社会领域的作用和责任最小化。市场被视为调节供求力量平衡的机制。市场决定产品的价格、产量和生产的方式方法。这种经济理论认为,正在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对所有政府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要求,包括需要促进出口,减少社会消耗,缩减国家经济控制,因而强化由资本来重组“国有”经济的能力。因此,这种思想要求重构政府特别是其公共部门。

当然,市场思想并非以绝对相同的方式适用于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例如,在教育部门,市场有其特殊的轨迹;而且教育市场在澳大利亚以独特的方式发挥作用并得到了发展。像在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教育越来越根据市场来考虑,比较强调“用户付费”而不是完全由国家承担经费,而且各种各样的市场正在引导教育的优先选择和拨款。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市场思想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不同于其他

国家,有时候与平等主义传统同时出现但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这样,在大学部门内部,通过高等教育贡献计划(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Scheme, HECS)重新引入了学费。推出该计划的目的包含保障入学机会和公平。与此相似,目前教育管理虽然实际上是在市场观念框架下发展,但是在联邦主义结构内施行的。在中小学校和技术及技术教育学院层次上,渐渐地出现了地方分权,国家的干预范围缩减,而且公立教育商业化。虽然这一趋势必将继续,但这些过程的发生和发展方式在澳大利亚并非像在其他英语国家一样。这样,在特定背景下,伴随这些发展所发生的事件仍然与国家 and 地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交织在一起。

敏于历史差异,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的新作《教育市场论》,综合了澳大利亚教育的市场趋势,而且试图解释为什么形成这些趋势,其重要性怎样与澳大利亚国家的某些显著特点相关联。不过本书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也提供了关于这些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及这些发展对教育和文化的影响的评论性观点。本书探索了教育各部门中最重要的市场导向的活动:中小学学校教育、培训、技术与继续教育、高等教育和研究。本研究将大量经验主义的政策导向的统计数据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以便将教育市场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其他广泛议题的框架之中。

在呈现这些分析时,马金森采用了源自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后结构主义社会文化理论相结合的解释。他结合福柯关于权力—知识关系的见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商品关系的观点以及赫希(Hirsch)的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①思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教育市场的形成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与身份、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密切相连的现象。这样,本书不仅从历史观点上说是敏锐的,而且从理论上也是富有洞察力的。本书确实是第一部独创性的教育市场理论著作。它关于教育中的地位商品和竞争特点的基本观点具有广泛的适切性。因此该书所提供的教育市场分析图将会证明,其对澳大利亚和国际上的学者及决策者等将有所裨益。

利兹维(F. Rizvi)和林加德(B. Lingard)

《教育研究丛书》主编

^① “Position”和“positional”在本书中是核心概念,一般被译成“地位”或“地位的”。本书相关短语有很多,如:地位价值(value)、地位生产(production)、地位产品(product)、地位竞争(competition)、地位市场(markets)、地位投资(investment)、地位特性/性质(character)等。当“positional”与“部门”(sectors)等词相联系时,本书将它译成“有地位的”。但当它与“产量”(output)、地位/身份(status)组词时,本书则将它改译成“位置”或“排名”。在书中的某些地方,position更多地指的是教室中的座位(一定学校的学生名额),与学生未来的身份、地位只有间接的关系,这时本书把它直接译成“位置”(而不是“地位”)。——译者注

表格与图表

表 格

- 2.1 教育生产的类型举例
- 2.2 教育生产的商品举例
- 3.1 1975/1976、1982/1983、1994/1995 年度不同来源的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
(1984/1985 年度不变价)
- 4.1 教育经济学的“实证性”
- 4.2 20 世纪 60~90 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与政府
- 5.1 1970~1995 年各级各类教育的学生数
- 5.2 澳大利亚 1987 年之前成立的大学:成立时间与 1975 年的学生数
- 5.3 1953~1984 年部分年份的医学与法学毕业生占全部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比例
- 5.4 1984 年不同类型高等院校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
- 5.5 1986 年不同家庭收入的学生就读私立学校的情况
- 5.6 1980 年在不同学段就读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比例情况
- 5.7 1980 年不同大学 and 不同性别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以前就读的学校类型
- 5.8 1975、1982 年各州主要私立学校接受的联邦经常性拨款(1984/1985 年度不变价)
- 5.9 1986、1991 和 1994 年的私立学校及其学生
- 5.10 1975~1995 年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分布(%)
- 5.11 1973/1974 学年到 1989/1990 学年 25~34 岁全日制劳动人员所获得的最高
教育资格比例分布
- 5.12 1980~1995 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情况
- 5.13 1980、1984 和 1989 年不同类型学校 19 岁学生上大学的情况
- 7.1 澳大利亚行业培训标准体系(ASF)
- 7.2 1994 年国家资格证书体系
- 8.1 1974~1986 年高等教育中学生资助的覆盖面
- 8.2 1994 年外国留学研究生所交学费
- 8.3 1987~1995 年高等教育中全额自费留学生情况
- 8.4 1989~1995 年高等教育中付费研究生与其他研究生的比较

- 8.5 1983 年和 1990~1994 年高等教育中的政府和私人资助
- 8.6 1983~1995 年各高等教育机构在五大维度竞争中的地位
- 9.1 1993 年在生物科学、医学和卫生科学领域的研究支出超过 200 万澳元(1984/1985 年度不变价)的院校
- 9.2 1981、1992 年澳大利亚大学在科学出版物方面与不同地区的国际合作
- 9.3 关于产业对研究生科研影响的态度

图 表

- 5.1 作为地位商品生产者的教育的体制结构
- 9.1 研究的组织坐标

目 录

表格与图表	V
缩略语和有关术语说明	vii
绪 言	ix
《教育研究丛书》主编的序	xii
第一编 市场的理论建构	1
第 1 章 导 言	2
第 2 章 教育市场的政治经济学	20
第二编 权力—知识—经济	37
第 3 章 市场自由主义政府	38
第 4 章 知识经济和教育	65
第 5 章 教育竞争与社会优势	92
第三编 教育市场的形成	123
第 6 章 公立学校教育中的市场	124
第 7 章 国家培训市场	143
第 8 章 高等教育中的竞争与控制	154
第 9 章 研究与知识商品	179
后 记	194
参考文献	197
索 引	226
译后记	243

第一编 市场的理论建构

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你面前流动的
总是新的河水……没有永恒的存在，一切都在生成中。

——赫拉克利特（希腊以弗所，约公元前 500 年）

in Bertrand Russell, 1946, p. 63

第1章 导言

如果因片面突出权力和控制(power and domination)而趋向于消除对经济制度的强调(这种强调本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那么这种极端的理念使理性遁迹……同时使作为矛盾对立体而存在的事物丧失理性的控制,即使进行补充性分析(complementary analyses)也于事无补。

——Frederic Jameson, 1989, p. 43

一 本研究

教育中的变革

1965~1975年间,澳大利亚教育有一个显著的发展。中等学校学生人数增长了43%,技术和继续教育中的学生人数增长了45%,大学和高等教育中的高级教育机构(advanced education institutions)的学生人数从83320增加到273137(增长了228%)。这种发展,部分原因是人口因素,但主要还是不断增长的高教参与率的结果。女学生的中学毕业率达到年龄组的三分之一,第一次与男学生以几乎相同的比例坚持求学。大学的数量从8所增长到17所。公立学校系统一直在迅速扩张,学生人数与全体学生人数的比例从1965年的76.2%增长到1975年的78.7%。天主教教育系统逐渐萎缩,但它们刚好得到了一笔被期望能巩固它们20%份额的经费(Karmel 1973)。其他私立学校的学生比例停留在不足5%的水平。

教育的扩张得到了空前增长的公共经费的支持,增添新的基础设施和专门培训成倍增长的人员成为可能。班级人数在不断下降,适应个别差异的、专门化的服务不断涌现。1972/1975年,在惠特拉姆(Whitlam)工党政府统治下,联邦完全负责高等教育的资金,建立了免费的第三级教育(1974年),促使TAFE现代化并提高质量,调查基于电视广播的开放的第三级教育。在1967/1975年间,联邦教育规划中的教职员数量从397名增至2895名(Jackson 1985)。教育公共支出总额,包括联邦和州两

级,从1965/1966学年的33亿澳元上升到1975/1976学年的98亿澳元,在短短10年时间内增长了几乎3倍(以1984/1985学年不变价计算,ABS 5510.0)。这是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时期,有助于提供不断增长的税收基础以支撑这种支出,但在教育上的支出也在相对意义上有所提高,其占GDP的比例从3.2%上升到5.9%。

除了部分私立学校教育(其中精英学校有类似卡特尔的市场)以外,教育是非市场的公共事业,而且它几乎完全由政府提供经费。来自私人资源的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从1965/1966学年的17.3%下降到1972/1973学年的10.8%,而且在惠特拉姆系列计划影响下,1975/1976学年进一步下降到5.6%。私人教育支出被抑制,这源于政府控制和机会均等的认识:人们相信为每个人提供“能力”(无论其经济地位如何)和高级教育(advanced education)是政府的义务,而且相信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在私立学校,来自公共资源的收入所占比例也在迅速增长;这使得天主教学校能逐渐淘汰不合格的教师。某些讨论涉及把私立学校按照英国的办法纳入松散整合的公立学校系统。私立教师教育学院和私立商业培训机构,正转入现代化公立教育系统,其支出全部出自公共经费(Marginson 1997a)。

20年后,教育的组织和经费的提供发生了变化。教育系统发展的方向改变很大。参与率重新有所上升,到1995年,四分之三的学生坚持学业一直到中学毕业,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达到60万,而且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的学生人数翻了一倍。但是,政府的拨款没有与教育系统的扩张保持同步。在20世纪80年代末,分配给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到5%以下。基本建设工程预算低,而生师比和班级人数却在上升。如果把根据“高等教育贡献计划”收取的学费计入私人投资,那么,来自私人资源的经费又回到占整个教育经费的20%的水平。已经有一部分教育不再接受公共经费:在中小学教育和培训中,政府现在鼓励私立教育部门的发展,公立学校学生的比例下降到71%。大学和TAFE重新收取学费,全额收费的国际学生市场营销成为主要的出口产业,而且在1983~1993年间,大学经费中的政府划拨份额从91%下降到62%。从1997年起,澳大利亚大学收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位于最高行列。公立院校不仅被期望自行筹集自己的部分经费,而且被期望彼此竞争学生、政府和企业支持。支配性的范式不再是作为普通公共事业的教育范式。它变成了一个教育市场,由政府背后操纵;学生和家长是这一市场的消费者,教师和学术人员是生产者,而教育管理人员则成为经理和企业家。

关于本书

市场^①的形成是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教育的一个特点。由于每一个现代社会中教育选择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由于教育中各种属性和行为的形成,所以教育的市场化是重要的(Marginson 1993a, 1997a)。这种变化既引人注目也有很好的文献支持,有助于本研究成为一项富有成效的案例研究。

本书的目的是提供综合教育市场(“市场化”)的趋势,解释这些趋势发生的原因和显著程度,反思它们的意义及影响。本书是这一时期的一部市场发展史,也是对目前中小学、培训、TAFE/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各部门中的市场动力的一种分析(由于资料限制,本书对学前教育和私人工业培训关注较少)。本书收集了广泛的论据,并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对其进行情境再现(re-situating),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理解市场化。

只有把作为经济现象的市场置于广大的社会、政治和其他各种背景之中,才能历史地理解市场。因此,本书采用了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和内容。其总体框架的构建结合了两大不同性质的方法: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其次是由福柯和英国后福柯主义者(Rose 1990; Burchell et al. 1991)以及葛兰西(Gramsci)、斯图亚特·霍尔和其他人建立的“社会学说”。这样,福柯主义者关于权力—知识的深刻见解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商品关系的解释以及弗雷德·赫希(Hirsch, 1976)关于地位商品的思想被结合起来予以分析。这种架构及其产生的潜力和张力在下文有较详细的解释。

本书资料来源众多: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如澳大利亚统计局),各种教育调查,各种委员会,OECD等国际机构,学术研究,公共评论和讨论,以及教育组织和机构。

本章余下部分将概括本书的理论框架。第2章也是理论性的,提供教育中市场产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种分析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市场被视为有内在经济动力的社会现象。本章主要讨论了作为地位商品投资的教育。对理论不太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第3章。

第二编论述了相互关联的三个主题,共同展现了教育市场形态出现的背景。第3章描述了1975年以来在经济变革和全球化背景中市场自由主义的权力—知识作

① 市场,一是指交易场地,即为货物交易提供场地;二是指一种广泛的交换形式,即所谓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市场是一个体系,包括各类风俗习惯、公共义务、宗教目的、政治考量、法律和行政规则、名望地位甚至是情感因素,自然包括满足物质欲求。参见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译者注